

东方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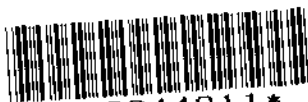
K835.348

东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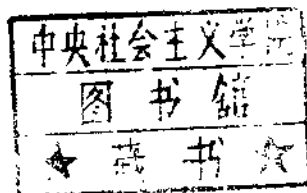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
新加坡以及后来在新
中国的经历

[丹麦] 霍格·汉森 著
孙宛裳 译

DJ51/51



20024401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五年·北京

ASIA HAND
by
Holger Hansen

东 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新加坡
以及后来在新中国的经历
〔丹麦〕霍格·汉森 著
孙宛裘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30千字
198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1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书号：11345·004 定价：1.25元

真诚的友谊 深厚的感情

周 培 源

霍格·汉森先生写的《东方》一书今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这是汉森先生用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写下的篇章。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加深中丹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汉森先生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开始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南亚各国的四十年代初期。1962年他来我国从事贸易工作后。亲自看到了新中国在工农业生产、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兴起；看到了中国经历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又重新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二十多年中，他先后会见过我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并和谷牧同志有过多次会晤，他对他们深表敬佩。在发展中丹两国贸易的活动中，他接触到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他还游览了我国的名山大川。因此，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从而和我国人民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愿意通过发展贸易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回忆从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没有多少外国朋友来我国进行贸易和友好交往。据汉森先生在本书中所描述，在新侨饭店除了三名日本客人外，只有他一个西方客人。他独自一人艰苦工作，开拓中丹贸易，不几年他便成为对华贸易的“中国通”，他所主持的宝隆洋行还兼为瑞典、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公司联系对华贸易。可以这样说，汉森先生不仅是发展丹中贸易的开拓者，而且是发展西方国家与我国贸易的先驱者之一。汉森先生在回到他的

故乡丹麦后，也为中丹贸易作了不少工作。如他曾积极参加接待叶飞同志率领的我交通部访丹代表团。

我和汉森先生是通过我已故的做翻译工作的女儿周如梅建立友谊的。他曾来我家做客。我去年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曾受到汉森夫妇的热情款待，汉森先生陪同我拜会了丹麦工程科学院，参观了和我国有联系的丹麦最大的水泥厂，游览了哥本哈根的名胜古迹。他们的盛情款待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友好，而是对我国人民深情厚意的一个表现。

汉森先生虽然生活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中，但他的奋斗精神和其他美德值得我们赞扬和借鉴。他有高度的事业心，从十七岁到宝隆洋行做学徒起，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工作和学习，成为该洋行的总经理。六十年代他在我国工作，各项具体事务他都亲自动手，处处表现出务实的作风。在青年时代，他就显示出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精神，在面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新加坡的形势下，他毅然参加保卫新加坡的志愿军。在日本占领了新加坡之后，他同当地的中国人一道住进马来亚山区，从此他的心里就播下了向往中国的友谊的种子。这粒友谊种子在他1962年到中国后发芽、生根、成长，成为他积极从事中丹贸易和友谊事业的动力。

汉森先生由于年龄关系，已从宝隆洋行退休。但宝隆洋行对我国的贸易在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仍在继续发展。1980与1983年我两次访问蛇口，了解到该行是蛇口最早投资设厂的极少数外国厂商之一。而他自己又成立了一个国际贸易咨询公司，继续为发展和我国的贸易而努力。

我衷心祝愿：

中丹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两国贸易不断发展！

序 言

在人生不可避免的坎坷和浮沉中，命运对我也有过许多恩赐。其中很珍贵的是我同中国人民和中国生活方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我青年时代的早期就已开始，先在中国以外地区，尔后在中国之内，终于发展到很深的程度。在我一生中，中国朋友对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对中国深怀敬意，我同许多中国人有着亲密的友谊，所有这些，我永远铭记在心。

这就是我撰写此书的背景，书中记述事件的时间跨度，从1935年直至1982年间。本书除了记载我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外，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一位外国人的观察，来概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充满重大事件的约25年的历史。这位外国人既有商人的实用主义，又怀着深厚友情；他写作此书时，已访问过中国不下80次，通常每次都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并周游了许多城市和地区。

我希望中国读者耐心阅读此书时，能够获得有用和有趣的东西，至少可以在你们伟大的国家正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努力并取得应得的成就时，提供一些精神食粮。

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要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表示敬意和感谢，正是他们在我为瑞典宝隆洋行将近47年的服务宣告结束时，鼓励我继续同中国合作，增进友谊，为此，我创办了丹麦国际贸易咨询公司。

在中国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访问中国的次数正在接近

100次，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我坚信绝不是最后一次。

最后，我对中国出版者决定出版此书的中译本和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



S. H. Hsueh
(Lao Han)

1985年6月于北京

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经历
献给我的妻子格雷特

目 录

新的开始.....	1
奔赴东方.....	5
仰光.....	6
仍处于和平时期的新加坡.....	15
经营化妆品.....	17
油漆生意.....	21
业余生活.....	23
到内地做生意.....	26
新加坡仍在和平中但战火已接近.....	28
入侵.....	31
崩溃.....	38
日本占领.....	41
收债.....	46
种地.....	48
铁蹄下的生活.....	49
战争的风云变了.....	54
日常生活中的形形色色.....	55
撤退.....	59
徒步穿越丛林.....	62
茶林.....	64
重返新加坡.....	69

回到丹麦·····	73
插曲·····	76
有关天地和中国起源的传说以及中国的简况·····	77
第一次中国之行：1962年 ·····	82
第二次到中国：1963年·····	89
苏联的对华政策·····	92
通行全中国的信用账户·····	94
外国公司的中间人·····	94
红色信使邮袋·····	96
冬天的问题·····	98
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	99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我的第二故乡·····	102
东方红 ·····	104
斯堪的纳维亚代表团·····	105
丹麦国家展览会——从设想到现实·····	107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110
展览会及展览会中的事故·····	113
冷酷的时刻——温暖的友谊·····	119
地道工程·····	122
北京古城墙的消失——建起了地铁·····	123
新的展览会·····	126
加拿大展览会：1972年8月·····	130
拍电影·····	132
大连的冬天·····	134
打赌·····	135

登黄山·····	140
月景·····	146
“四人帮” 倒台·····	147
汹涌的长江水·····	149
提供先进印刷技术·····	152
中美建交·····	154
皇家来访·····	156
告别与展望·····	161

新的开始

我生长在丹麦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很少人想到镇上今后会有人长期生活在外，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世界之中心的地方去，那儿的生活方式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更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我。我在1935年夏季到哥本哈根，在宝隆洋行（或称公司）当练习生。那年我才16岁。当时还没有签合同和发聘书这种手续，所以我就直接参加了工作。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宝隆洋行所属各部门都争着要新手，对于怎样安置我，进行了协商，他们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讨论，才作出决定，让我管理来信，把堆积如山的信件整理归档。一个人外出谋生，一下火车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在我之前人们就是这样，我也不例外。刚到哥本哈根，便置身于大城市之中，既没有家，又没有朋友，也几乎没有钱。便宜的住房一般都离市中心较远，无轨电车的车费眼看就要吞没了我口袋里的钱。我不得不把剩下的一丁点钱买了一辆旧的但还不错的自行车。

星期日是最难打发的。开头几个月我进城去给家里打电话。但是家人的安慰对我无济于事。再说电话费也很贵。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我的老嗜好上——拉小提琴。我参加了学院管弦乐队，严格说来我还够不上这个资格。为了取得学历，我又在秋季进了函授学校的英文和德文班。这样我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幸亏命运替我安排了一切。一天晚上我回到住所，生火点炉子，没看到我的小提琴靠在屋子当中火炉后面。这是那友好的房东太太出

于好心为我这个忙忙碌碌的年轻人整理房间时放在那儿的。晚上我被一阵噼啪声惊醒，还闻到一股怪味。小提琴烤糊了！上面的胶裂了口，漆起了泡。真是一场灾难。我拿到店里去修理，要价250克朗。我要一年才能攒够这笔钱，这之前只好不拉琴了。

有一天，我遇到哥哥的一位同学，他租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房子，要找人合租。从那里骑车上班相当远，不过对此我已习惯了。这房子对我说来十分理想，有暖气，还能洗澡！此外还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可以自己在厨房里做饭吃。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情趣，因为菲特贝亚公园近在咫尺。

这时我的小提琴也修好了。我不再去学院管弦乐队，而和两位夫人在一起搞室内音乐。她们都很“老”，比我大二十多岁，可都是出色的音乐家。爱塞·伐格宁是世界闻名的钢琴伴奏家，艾尔斯·托柏是小提琴家。参加这个三重奏对我说来是既有意思又有益处的，同时还加深了我儿童时代学的音乐理论。后来在我当了日本的战俘时，这点音乐知识还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

我通过了商业函授学校的英文、德文和法文的考试，还选修了一些必要的口语课，特别是法语课。许多年后，我在新加坡做日本人俘虏期间，因为懂法语而获准每周到法国的国外传教会去会见德瓦尔主教。他很了不起、很勇敢。那一年多的交往使我得益非浅，我指的不只是语言方面的。可惜德瓦尔主教在战争年代就去世了。

尽管我很忙，我还设法攻读了商业法，这在当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上司同意我去学习，但条件是：要我自己先垫付学费，等我在商学院毕业后，公司才把钱还我。

我几乎一开始工作就和远东打交道。从每天往来的书信、电报中，我接触到一些特殊的遣词造句，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那边悠然神往了。早些时候我曾参加了《政治报》的一个讲座，听过

一位农场经理讲他在东方的生活体会。他讲得有声有色。有一次他提到他在一条船上，和水上人家住在一起。他和当地人处得很好，以至有许多人尊称他为“父亲”。数年后我碰巧也到了他提到的那一带地方，我向当地人谈起了他的那个讲话。那些人說：“这不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的确像是我们的父亲。”

在我学生意的年代里，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过去在欧洲和远东的贸易上，东方基本上是提供原料，如棉花、黄麻、矿石、橡胶、锡，食品则包括干椰肉、茶叶、咖啡、大米、糖、香料等。源源不断运往东方的商品是些轻工业产品，如炼乳和其他罐头食品，波特兰的水泥（其中常有一半在运输途中就结成了块，不能用了），铁杆、做铁丝网用的铁丝，以及铁钉、螺丝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有迹象表明这种贸易模式已经有了初步的变化。东方刚刚迈入机器时代，当然离技术时代还很远。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词儿还没有“发明”呢。

机器时代给东方带来了小型工业。不仅外国人开办一些与农场有关的工业。当地的商人也经营一些简陋的工厂，生产铁钉和罐头食品之类。例如，缅甸人热衷于采矿业，使得欧洲人有机会向这一地区出口供发电用的柴油机，供电动水泥搅拌器用的汽油或煤油，还有机床和采矿机等。机器时代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当时汽车已经相当普遍，因此汽车修理业和汽车维修站就应运而生。有些地方设备优良，活干得很漂亮，当然也有差的，但它们对改变商业和就业的形式作出了贡献。

那时还没有空运，运输主要靠船只。一封航空信要走两三个星期才能从欧洲到达东方，而且邮资昂贵。信纸极薄，要衬在另一张厚纸上才能阅读。东方的进口商人希望在出口国方面有个帮手，希望和欧洲的制造商打交道时能有个中间人，这个人要能独

立工作，熟悉东方人的思想，并和买卖双方都有联系。

一个有抱负的年轻练习生担任这一工作是要经受不少考验的。首先是语言知识。许多德国商人不会或不愿讲英语，而东方人则只懂英语，只有那些住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人会说法语，但他们都不懂德语。这些商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等国的人。即使那些住在东方的丹麦人，懂德语的也不多。

当时往泰国或仰光打电话可是一件大事，要两三天才能接通。练习生们就担任这项重要的工作，在电话室里对着听筒大嚷大叫。电话室紧靠着雇员办公室。我很走运，我的上司在接通了电话之后，要我另拿一个听筒听他们的对话，看他是否把要讲的都讲了，并让我事后把他们的对话整理成一个报告。这类长途电话往往是这样开头的：“今天仰光的天气怎样？你说下雨啦？好象老天爷决心要落到市中心啦？什么？街上涨水了！哦，雨季就要到了吧？”在正式对话结束以后，人们还可以从电话里获得许多消息，可以查询信件，了解办公室或者图书馆里有哪些书，我有时还打听用我那一点工资能买什么书。我总是打听或者要求对方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因此，在我被派到东方去工作之前，我已经“生活”在那里了。

我们有时也有外事活动。像外国参观者来访之类，常常派我负责接待他们。接待那些会讲欧洲三大语言之一的欧洲人我毫无困难。可是有时候我要接待中国人，那时我还不懂中国话。幸好我们的副总经理杰柯布逊懂。每当有中国人来，他会不请自到。我们青年人认为他很愿意当着大家的面显示他很能干，精通中文。

奔赴东方

1939年初战争的威胁已像一片乌云笼罩着欧洲。上司要我准备好随时去东方工作。这一计划和当时的征兵通知是相矛盾的，后来当局宣布我不适合服兵役。9月3日战争开始了。就在这一天我接到我们洋行的通知，要我动身去东方。副总经理杰柯布逊对我说：“今晚你回家去向父母告别，很久之后你才能再看到他们。”

9月5日清晨我从卡斯特楚普机场起飞。父亲送我到入口处，在飞机起飞前他一直向我招手示意。那是一架只能容纳21位乘客的小飞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着陆。我们幸好乘坐这一航班，因为第二天的飞机就遭到德国飞机的袭击，一位瑞典旅客被打死，从此这条航线就停止了。

我们从阿姆斯特丹乘公共汽车到鹿特丹，从那里再坐船去东方。船经过英吉利海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里有德国的潜水艇，他们见船就发射鱼雷，不管船上插的是哪国的旗帜。我们组成一个船队集体行动，由一艘英国驱逐舰为我们护航，晚上把发动机停了，到天亮后再继续前进。当船驶过地中海时，人们谣传德国潜艇已经偷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地中海，因此这里也不是安全地带了。当我们穿过苏伊士运河时，天气酷热难当，许多人都睡在舱口，不愿进入那闷热的舱内。那时空调设备还不多，而电风扇简直就不起作用。

大约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到达了槟榔屿。稍事停留后才继续

向东前进。在槟榔屿时，我行的一位同事坐了一辆人力车到码头来接我。他有一辆小汽车，但是他说：“坐小汽车在城里转太费钱了，人力车很便宜，也一样的可以坐两个人。”

我和这位同事不熟。我刚刚参加工作。他显然是位上司，是他要求我们洋行派一个新手常驻仰光的。当时他给我送来了午餐，别的我已记不清了。后来，他带我坐小汽车游览槟榔屿岛和槟榔屿山。这次游览使我终身难忘，它使我从此迷恋上了东方。我爱那青葱翠绿的自然景色，爱那覆盖大地的五彩缤纷、生气盎然的繁花，爱那富于浪漫色彩的棕榈树，它们迎风飘拂，发出沙沙的响声。那些粗大的棕榈树，疏密不匀地矗立在耀眼的白色海滩上，它们那深绿色的树梢映在那蓝色的天空之上。我们站在岛上，四周海浪滚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身边的是黄绿色，稍远的是深绿偏紫，与天际相连的海水则是一片蔚蓝。

仰 光

游览之后，他就送我上了一条开往仰光的船，这船叫卡拉派拉号，是当地人经营的。这一下真是天壤之别，这船又旧又脏，管理很差。水手全是印度人，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衫，褪了色的蓝裤衩，光着脚（那时候，我还不习惯看到别人光着脚走路）。晚饭也不值得一提。晚上当我躺到铺位上时，看到一张告示，要旅客关好门窗，谨防小偷。那一晚上可真热，尽管如此，白天槟榔屿给我的美好记忆还是战胜了一切，我满脑子全是那些绚丽多姿的海岛形象，想着想着就入睡了。

四五天后，我到了仰光。当我站在仰光码头上时，离我在哥本哈根登上小飞机时已经一个月了。

我住在一所公寓里，女房东是个欧亚混血儿，丈夫是苏格兰